

Zhongguogudan
De Jiliyugeyao

中国古代的

祭礼与歌谣

〔法〕格拉耐著、张铭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 的祭礼与歌谣

〔法〕格拉耐著

张铭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呈富

封面设计：何礼蔚

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

(法)格拉耐著

张铭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78,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1-0178-9/I·134 定价：3.45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编 诗经的情歌.....	11
第一章 怎样阅读古典.....	11
第二章 田园的主题.....	31
第三章 村落的恋爱.....	56
第四章 山川的歌谣.....	91
第二编 古代的祭礼.....	147
第一章 地方的祭礼.....	147
第二章 事实与解释.....	157
第三章 季节主义.....	166
第四章 圣地.....	178
第五章 竞争.....	187
结论.....	201
附录一 关于歌谣(十一)的注——俚谚竞争.....	231
附录二 关于歌谣(十六)的注——关于虹的信仰.....	244
附录三 人类学的资料.....	250
译后记.....	282

绪 论

我的愿望是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了解古代中国的习俗与信仰并非是不可能的。有关这些早期的可靠文献很稀少，而现在的那些被称为是早期的可靠的文献，多为稍后一些时期的。我们知道当秦帝国废除了周的封建制之后，它决定毁掉这些制度所凭靠的全部经典。然而帝国一旦得到确立它又希望有经典作依据，于是书又被重写出来了^①。人们虔诚地做着这项工作，因为描述前代以规范后代是当时帝国建设的需要。由于人们的严肃的态度，所以前代的史实并没有被任意歪曲，并不至于使历史家无法从中得出满意的结论^②。这就是说，研究诸侯国时期的组织状况是可能的。许多人通过对这些古典本文的比较研究，已经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祭礼^③。但在完成这一切之后，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不过是正統的官方的宗教。

对于这种宗教的描述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必须了解从何种习俗与信仰中萌生出了诸侯国时代的官方宗教的问题。假如不去努力从这些本文中发现正統宗教的浓缩形

态之外的一切，那么一旦试图去解释它们，便会发觉自己遗失了什么。事实上，当一个人讨论起中国人的原始一神教，或指出他们总是崇拜自然力及行为上的祖先崇拜时，他已经说了全部可说的东西^④。

停留在这种贫乏的一般性上的研究会使研究者误入歧途。一些人不做任何努力去掌握古代中国盛行的宗教意识的本质因素，而甘愿将时下观察到的事实作为起点^⑤。他们起草清单^⑥，推敲文献，但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呢？有时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价值也只能归功于中国人自己对他们的习俗的解释；如果他们自己说某种固定仪式是为了驱赶恶灵，那么这个结论就被当作事实接受了^⑦。不然的话，就把将要解释的习俗随意地同这样那样的流行理论挂上钩。根据时下流行的是自然崇拜还是万物有灵论而定，这项习俗或被解释为普遍的精灵信仰，或被解释为有关太阳和星星的自然崇拜^⑧。这是一种不严密的方法，它将妨碍对事实的精确分析，甚至破坏其编目。试想，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一个祭礼如果发生在季节的至点或分点时，它立刻可被标为太阳的祭礼。然后从这样的限定出发，便试图推断祭礼的全部特征^⑨。如果是一个星星崇拜的疑问那就更加方便^⑩，有了对于中国古文化的良好自信心和在岁差上的训练有素的巧妙手段，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有时候，历史近于救援，人们会有兴趣回到过去去为今天的事寻找答案。这种想法很了不起，但有多少风险要避开！一般说来，关于事物起源的研究易于导致谬误。在处理中国的事件上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本土的学者们不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真正

起源上，而乐于考证表示该事物的词语被第一次使用的历史年代^⑩。而且，人们所追究的，是对于由习俗构成的观念的认可——通过那些记叙它们的人而不是实际运用的人。立证越古，就越易被人们接受。出于对这些立证权限的尊重，从未有人想到对这些立证需要进行严格检验与审定；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些立证显然是从后代人的观念出发的；甚至没人理所当然地考虑过为了将概念变为实证的叙述，必须把所有的观点，学者们所有的论述中的全部错误加以全面的考虑。

无论是愿意简单地用外部的评论来类别这些本文的文献史学家的方法，还是喜欢以中国本土的报道者们的记述或某一学派的论述为依据的民俗学家的方法，都是无批判的，因而不是有效的方法。依我看，要得到预期的结果必须有双重的小心：首先，在我们从文献中抽出所需事实之前，先要确定这些文献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事实的正确价值；其次，对于已获得的事实材料，尽可能用实证的叙述表现出来。聪明的做法是要避免到它们本身之外去找东西，因为也许它们会被加上这样或那样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把现在这项研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试图正确表明所利用的主要文献的性质；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要对大量的彼此关联的事实整体进行说明和解释。

文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对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的研究中，我们为什么选择《诗经》^⑪里的爱情歌谣做对象呢？《诗经》是一部古典著作，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宗教形式。这点很重要，但是那些对古典原

文没有较高认识的人是不会利用这一优势而去选择原文的。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打算在古代事实中为现代事实寻找来源。在研究过程中，我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要在不同时期的类似事件之间确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比如现在收集到的一首客家歌谣，各方面都显得与至少有二十五个世纪历史的《诗经》里的一首歌谣极其相似^⑬，然而客家歌谣却不是《诗经》的模写。二者都是对于同样的事情的即兴吟唱，客家的歌谣无疑在二十五个世纪之间，每年创造相似的诗句^⑭。同样地，任何时候风俗都会通过不断更新创造得以存续。一项惯习，不是仅仅把它与从前存在过的相同的惯习相联结就能够说明的，而必须通过确立一种事实上的联结关系，即将惯习作为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进行解释。有时候，揭示一种信仰的基础，近代的文献比古代的文献更有效。因此，在面前的这项研究中，我当然也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样的近代文献。通过适当的古代的事实来证明现存的真实的事实在过去也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好方法。但过去比现在更易于了解，所以我要直接地研究过去。倘若问我为何如此，答案很简单，因为过去的研究只是单纯的事实问题。

《诗经》的文献价值，尤其是情歌各篇的文献价值，是可以准确地确定的。这是挑选《诗经》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首先一个理由。同时，象《诗经》这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准确性的文献别无他见，这也是选用它的主要理由。

诗歌，即使是经过后世的编纂，也难免由编纂者作了些改换。与散文相比，在诗歌中更容易区别本来的思想与掩

盘其上的各种其他思想之间的差异。因而我们对于《诗经》没有注释混入本文之忧^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把本文与对本文的种种解释分别加以研究。人们一方面可以研究诗的本文，同时还可以研究本文的历史。由于对这种历史的理解，能够更加了解诗的本文。

如果本文是古代的东西，那它当然是古代事物的一面镜子。如果正确地理解它，它就会发挥这样的作用。但要理解它很不容易。而且如果没有注释家的帮助，我们从中将不会看出多少东西来，这是事实。我将首先找到一种方法，超越诸种注释书去努力揭示本文的原始意义。要找到各种注释的钥匙，重要的是去了解注释家们，但不是必须去重构他们各自的心理。这些注释家构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著作规定了注释的传统原理。这是一种象征的原理，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公式理论之上的。它在政治活动和自然运动之间虚构了一条相交线。

我要证明这种热衷于象征意义的偏见——对于这点学者们感到象是被一种规范化的伦理的羁绊束缚了起来——将把他们引入他们自己有时也承认的荒唐之中。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注意力应放在何处。但我们也会看到，这种对于诗歌的比喻式的注释揭示了作文的一条本质规律，一条形式上的法则：就是对称的法则，是对偶的用法。懂得了这一法则的人便可读懂并翻译《诗经》了。

能够阅读本文，并懂得了注释者的心意之后，再将本文同注释进行对照比较则所获甚多。倘若离开注释去阅读，《诗经》中的诗歌确乎是民谣。尽管传统早已把它们当作学

者们的经典。人们很容易这样说：“我们把传统的注释放在一边吧，因为事实证明它把人们导向了对本文的曲解。”那么最好先问一问这些误解是怎样引起的。学者们——并且是这方面的优秀学者们——竟不能解释自己的本族语言，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那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学者，他们与其说是艺术的爱好者，还不如说是官吏。他们将诗歌服务于政治伦理，于是不再承认其庶民的起源。从一个政府官吏的思想来推论，道德是天生的。这些诗是出于德义的灵感。因此，诗歌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学者们的著作。

因此，这些用于道德教化的歌谣，不能不成为官厅诗人们的作品。但是这种道德的效能是从歌谣的什么地方抽出的呢？让我们先设一个假定便好理解了。如果能在古老的情歌中发现人生的准则，那是因为，尽管人们出于误解，但诗歌的字里行间依然回响着古代道德之声。假如这些歌谣没有一个教义的起源的话，那些象征解释方法将显得毫无根据，也不再充满智慧。

有些一看便知是古老歌谣的诗歌，往往具有很高的教义价值。人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做事，这种现象恰巧与自然界受季节交替支配的现象相似。于是这种想法就成了从民谣中抽出象征的道德的开端，人们在歌谣中看出了季节规则的形迹，最后，诗歌表现的道德教训给诗歌本身的意义又加上了歪曲的解释。因为这种道德教训决不是注释家们随意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歌谣了解先于古代道德而存在的习俗。简言之，歌谣对于古代中国的季节仪礼的研究来说，是最为适当的文献。

如果脱离各种注释书来考察歌谣本身，这些歌谣的文献价值将会大大增加。它们使得对一般集体创造物的剖析成为可能；可以看到它们是一种传统的和协同创造力的产物；它们在仪式舞蹈的过程中，针对某种特定的主题即兴而作。古代的农事祭主要是口头仪式，因而产生了即兴吟唱的歌谣。这些歌谣保留了在定期的集会中产生的感情的直接证据，从而我们凭借这些歌谣的研究，可以了解季节仪礼的根本功能。

这样，对于主要文献的研究将不仅使我们确认种种事实，同时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我要确定这些歌谣所表现的一般特性属于何种古代祭礼。

首先由于它们自身的关系我要描述某些地方祭礼。对于每一对象我都将列举我能收集到的全部文献，仪式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各种行为的解释。这样做不是为了重现祭礼的图象，它将证实地方祭礼的特性不是表面化的，从而弥补文献的缺陷以导向祭礼的本质。

有四种祭礼可以得到再现：其中有两种是古代的形式，另外两种是在诸侯时期祭祀中发现的形式。两组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并且在其中之一的现象中，可找到标志祭礼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阶段的原型。这样，关于由庶民仪式向官方正统崇拜的仪礼的转化的研究就成为可能的了。

这种研究有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首先要区分开真实的信仰与那些多多少少个人化了的解释。事实上，从这些解释中引申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即使在只剩下信仰自

身的情况下，它们也可能使人产生误解而过于匆忙地把它们同行为联系起来。信仰与仪式并不是非要互相依靠不可的。如此如此的一种仪式或如此如此的一种信仰都不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仪式源于信仰，或信仰源于仪式——它们都来自比自身更早的存在；它们可以独立地从中生出。这样当它们在被发现同时并存的那一刻时，它们也许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论是从现代仪礼的解释中，还是从根据它的每种行事的涵义中，都不能推论出有关原始集会（后来演变为仪式）的功能和集会中发现的类似行为的价值等问题，各种习俗早已被加上了多种多样的功效，唯有行事的效力是永恒的存在。因此，在揭示这种行事的效力如何特殊化之前，必须首先说明行事的效力。

因而我将从古代的仪礼的总体入手，用最一般的眼光进行考察，古代祭礼根本上是季节性的。这种祭礼具有这样的特质——人类的作用能够左右自然事象。我将通过适当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种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良好的秩序，同时也能在自然界建立良好的秩序的和亲的祭礼。它们在山岳、河川的神圣区域内实行。通过对诸侯的山川祭拜的研究表明，赋予山川以神圣的威力正是源于对圣地的崇拜。因为圣地是从前原始共同体在此举行季节性集会执行社会契约的传统见证人。重要的是，^⑧这些节日都是由即兴对歌作为口头伴奏的竞赛构成的。通过对这些对歌所表达的情感的分析，可证实为什么这些仪式竞赛会被选中作为一种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建立友谊的方法。我也要努

力解释为什么它特别要放在春天，为什么要通过男女之间对抗竞赛的形式，并且通过一种共同的订婚礼，使得地方性的不同组织结合为一个传统的共同社会的同盟。这种在根本性质上就是两性仪礼的演习的集会，直至最后从未成为骚乱的场所。我们通过展示古代中国人在爱情方面的情感与歌谣中表现出的非个性形态的来源，将会使大家看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相信这项工作使得有关中国人信仰的起源问题的某些方面趋于明确。它也会在有关文学样式起源的问题上提供某些信息。它还将把存在于象征主义与中国思想的某种指导概念二者之间的接触点显现出来。最后，它将为研究由庶民集会到官方仪礼的演化过程扫清道路。看来我们已经面临着许多问题有必要给予正确的解决，然而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认为就中国人的宗教史研究的目前状况来一次彻底的探索——就象人们说的，就会其用无穷。倘若能够做到适当地提出和接触一些问题，并已粗略地勾勒了这项工作的轮廓，我将感到欣慰^⑤。

〔注〕

- ① 参照Chavannes译《史记》的诸论和兰格译《诗经》的序论。
- ② 见Chavannes, *le T'ai chan*, p. 453. 封地授与的书式。
- ③ 见Chavannes的 *le Dieu du sol (le Tai' chan. App. 437 — 525)* 研究。
- ④ 这是初期的传教士Rèville, Courant, Franke等人的态度。
- ⑤ 例如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t. XII 所载的De Groot的 *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Emouy*. 见其序文。
- ⑥ 如De Groot的目录, Wiegner的 *le Folk—lore chinois*.

- ⑦ 参照De Groot, Emouy的春火的说明。
- ⑧ 这是De Groot的Fêtes d' Emouy的态度。
- ⑨ De Groot, Fêtes du 5^e mois, p. 311. 以下。
- ⑩ De Groot, Emouy, p. 436以下。
- ⑪ De Groot, Emouy, p. 231以下。如关于“上巳”的名称的研究。
- ⑫ 在《诗经》研究中,我利用了如下各种文献:宋本。《毛诗注疏》。《诗经精义集抄》。此外我还利用了《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中的近代述作,特别是其中的《毛诗故训传》(《经解》600—629页)、《毛郑诗考证》(同上, 557—560页)、《毛诗传笺通释》(《续编》416—447页)、《毛诗后笺》(同上, 448—477页)、《毛诗传疏》(同上, 778—807页)、《鲁诗遗说考》(同上, 1118—1137页)、《齐诗遗说考》(同上, 1138—1149页)、《韩诗遗说考》(同上, 1150—1158页)和《诗经四家异文考》(同上, 1171—1175页)。
- ⑬ (十七)与客家歌(六)(附录(三))比较;(四四)与客家歌(十二)比较;(二五)和(二八)与客家歌(二七)比较。在比较中我们会时时发现客家歌比中国古代歌谣更洗炼。《卫风·伯兮》的三章、四章与客家歌(十二)、(四)比较。
- ⑭ 《王风·葛藟》的“绵绵葛藟”与罗罗的哭嫁歌(附录三)的“小草哟,是我的伙伴”比较。
- ⑮ 用散文记述的仪礼就不是这样的。见《礼记·郊特牲》中的八蜡的祭礼。

第一编 诗经的情歌

在此，我想研究《诗经》的若干诗篇，这些诗篇主要是从《诗经》的最初部分——《国风》中抽出来的。这些《国风》是恋爱的歌唱，是肆无忌惮的感情的吐露。

第一章 怎样阅读古典

《诗经》^①是古代诗歌的编纂集子，是中国的古典之一。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按国别分类的地方歌谣的编纂^②；其他三部分特别含有仪礼的歌谣。

据传统的解释，《诗经》的歌谣是由孔子编选的。据说孔子在宫廷的司乐们保存的诗篇中，把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篇采录出来编纂为诗集^③。因为地方歌谣（《国风》）能够证示封建诸侯所统治的各国的风习，所以在诸侯的领国内被定期地编辑^④。《国风》中，开头的两篇（《周南》、《召南》）^⑤虽然一般被认为是宫廷之作，但是后来也多在藩领

的村庄中传诵，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

据《论语》记载⑥，孔子认为研究诗能够有助于德行的实践，因此规劝弟子们学习《诗经》。他认为培养道德反省的习惯和对于社会的义务责任感，抑恶扬善，这正是学习《诗经》的益处。并且他还认为，不仅是道德的教训，关于事物的实际知识如鸟兽草木的名称等等都能从《诗经》中得到。

于是，《诗经》被当作君子修养的有益书物，被大圣人孔子赋予权威，作为教科书，至今仍被尊重。

《诗经》最初在孔子直系弟子的学派中使用⑦，那些就政治的格言、道德的训言、仪礼上的法则等问题大发议论的孔门高足们⑧，后世称之为儒⑨。这些未来的政治家、仪式的临时教师们，从《诗经》中寻求道德反省的主题，于是，逐渐确立了《诗经》解释的传统。

这些国家的见习顾问官特别重视先例的了解。根据孔子的教导，顾问官们通过这样的方法确实得到许多知识。正因为如此，初期的儒者们，一方面在《诗经》的诗句中看出对历史事实的讽刺，另一方面，又在编年史记载的演说和论说中引出《诗经》的诗句⑩。实际上，《诗经》几乎全篇再现于《左传》⑪，反之，几乎全部的诗都能够用《左传》中抽出的事实加以说明⑫。如此的《诗经》注释和《左传》的编纂都是由孔子学派完成的⑬。

于是，《国风》的歌谣就同历史故事相关联，具备了说明道德和政治的概念的功能。

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学派。他们有的居家从事，有的巡游列国，他们的学说也或多或少呈现出独立的

立场。因此，不难想象关于《诗经》的理解，其间也存在多种传统的解释。汉代，当遭到秦始皇^⑭焚书厄运的《诗经》被重修时，便出现了四个异本^⑮。然而虽然称之为异本，也不过在缀语细部上有些差异，正文的确切性仍是可信的。传承下来的唯一的注释书是毛氏的注本。而人们又把毛本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把《毛诗序》这个简短的解说作为子夏之作。《序》中的解说的性质完全是历史的道德的并且是象征的。

从毛诗以外的现存三家的残留来判断，我们得知这种解释方法是带有普遍性的。倘若其他三家诗的异本完整地保存，根据三者之间的详细的比较研究，藉以明瞭不同学派的见解和各学派的特色，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退一步讲，即使从现存的本文出发，如果把在史家特别是《左传》《列女传》中能够看到的《诗经》的引用句全部利用上，进行这样的研究也是可能的。这种研究对于中国历史起源的考察是一种卓越的贡献，然而对于歌谣的本质意义的认识来说，却不能有所增进。

这种象征性的解释在汉代是普遍的现象，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种象征性的解释使得《诗经》的教育价值更增进一层。研究《诗经》，不仅是为得到博物学的或关于古代国民的知识，而且同编年史相比，《诗经》研究甚至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政治史，人们能够在象征的样式中发现事实之外的价值判断。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表明道德判断的实际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封建时代的家臣们最忠诚的表现